

论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起因

王义伟

台湾乡土文学是在我国现代文学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从“五四”运动到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怀抱这一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实际上就是一部乡土文学史。

国民党逃台后，台湾文坛几经变化。50年代以反共文学和怀乡文学为主，60年代现代派文学盛行，至70年代，乡土文学重新崛起，成为文坛主流。

1972年，台湾文坛发生以反对现代派诗人颓废诗风为主题的“现代诗论战”。这场论战以后，乡土文学取代了现代派文学的主流地位。在此后的几年里，乡土文学在创作上、理论上都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

1977年，关于乡土文学的讨论进入高潮。对于乡土文学的分析、评价成为台湾文艺界的主要话题。对于乡土文学，有颂扬的，也有批评的，参加者日众，争论也日趋激烈，进而演化为壁垒分明的两派之间的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战。

这年8月，台湾《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彭歌、台湾现代派诗人余光中先后发表文章对乡土文学作家进行政治指控。接着，一批“文艺理论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指责乡土文学作家和理论家是共产党的统战工具或有“台独”之嫌。台湾《中央日报》、《中

国时报》、《中华日报》、《联合报》、《青年战士报》等报纸也都发表社论批判乡土文学作家，一时之间台湾文坛风起云涌，形势陡变。这一场突然发生的风波被称为“乡土文学事件”，是乡土文学论战中的一支“插曲”。

1978年初，乡土文学论战落幕。

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前后历时不到两年，参加论战的作家、理论家、学者达百数十位，在几十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百万多言的论述，其规模之大、争论之激烈，在台湾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都是空前的，其影响也十分深远，成为任何一个研究台湾文学的人都不能回避的话题。

到底是怎样的原因，酝酿出了台湾文坛这样一场如此大规模的文学论战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试从文学理论、经济、政治等方面分析一下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产生的原因，以就教于研究台湾文学的同行们。

—

从文学理论发展的角度来说，乡土文学论战直接受到1972年“现代诗论战”的

影响。

让我们先看看现代派文学在台湾文坛崛起的情况。

现代派文学在台湾文坛的崛起并非偶然，有其多种内在的外在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台湾受西方文化和文艺思潮侵袭和影响。50年代初，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接着是大量的“美援”、“日援”涌入台湾。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商品的输入，西方的文化和文艺思潮也泛滥起来。

“在这个背景上，从美国新闻处，从香港，从精英大学的外国文学系，从大陆流亡来台汪伪时期的‘法国象征’主义，从欧美画坛的画册，汇集成一股‘现代主义’风潮。这个风潮主张文艺的绝对纯粹性，反对意义、反对具象、反对情节、反对故事。意义即内容的消失，相对地使形式不断地膨胀，在表现形式上（语言、叙述、构图、颜色）不断地晦涩化、怪异化。在艺术作品中历史、时间、人、社会随意义的消失而消失。外在一切约定俗成，可以沟通的符号被取消，作品流于人类最混沌的心理世界的、无政府的进流。

“‘现代诗’、‘现代画’、‘现代音乐’、‘现代小说’、‘现代（实验）电影’，在50年到70年成为文坛显学。‘五月画会’、‘东方画会’、‘现代诗’、‘创世纪’、‘笔汇’、‘现代文学’、‘文学季刊’、‘欧洲杂志’……纷纷在50年以降结社和创刊。”^①

由此可见现代主义在台湾的盛况。当然这种盛况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是西方强加给台湾的，现代主义在台湾的盛行，也有其种种的内在因素。国民党逃台后，对青年人实行严厉的思想压制，禁止他们阅读大陆的书籍，尤其是“五四”和30年代的文艺作品，民族文化传统被人为地隔断。青年

们无法继承祖国的文化传统，只好转向西方文化去寻求出路。同时，当时台湾的相当一部分文学青年，是经历了大陆解放战争的战火到台湾的。战争中可怕的、痛苦的经历使他们情绪十分颓废。来到台湾以后，他们对台湾这样一个十分封闭的环境也非常不满，但碍于高压政治的压力，他们不敢直接揭露现实、抒发自己的不满，只好用现代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讽刺艺术和比较隐晦的表现形式来表达这种情绪。另一方面，现代派文学又是对50年代流行的反共文学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反叛。50年代的反共文学在一开始还颇能迷惑人心，可是不久人们就意识到“反攻大陆”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口号，很多人把“反共文学”称为“反共八股”，它的公式化、概念化使文学青年十分厌恶，从而转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派文学就是这样在当时台湾内部的、外部的种种因素的影响下由萌芽到发展，以致在60年代盛行起来。

但现代派文学从开始出现，就不断受到台湾文艺界特别是乡土文学派的激烈批评。

70年代初，台湾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和理论家陈映真、台湾著名文艺评论家尉天骢先后在《文季》、《剧场》发表文章强烈批评现代派小说。陈映真在《现代主义的再开发》一文中指出现代主义应该受到批评的主要两点，一是台湾的现代主义所受到的是最腐败的西方现代主义末流的影响，在台湾缺乏存在的客观基础；二是台湾的现代主义作品在思想上、知性上比较贫弱，只是在语言和形式上玩弄一些技巧而已。

陈映真对台湾现代派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确实有一些台湾现代派作家的作品，脱离了台湾的现实生活，照搬照抄西方现代

文学中的消极、色情、精神分裂等思想内容，甚至加以渲染，一些现代派诗人，单纯追求离奇古怪的形式和艰深晦涩的语言，还自以为“时髦”、“前卫”，这些都引起一些岛内文艺理论家的批评。

台湾岛内对现代派的批评引起海外知识界的回应，他们对现代派文艺的中心——现代诗，展开了批判。

1970年，任教于新加坡大学的关杰明发表了三篇论文：《中国现代诗人的困境》、《中国现代诗的幻境》、《再谈中国现代诗》，对台湾的现代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在文中指出现代诗作者忽视传统，盲目认同西方文化，“是生吞活剥地将由欧美各地进口的新东西拼凑一番而已”，所以现代诗缺乏“中国精神”。

留美归来的唐文标教授的观点则更为激进，他于1973年发表了《论传统诗与现代诗——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②、《诗的没落——台港新诗的历史批判》^③、《僵毙的现代诗》^④。他认为现代诗人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幌子，努力逃避现实生活，做个人的无病呻吟，是在逃避现实中过日子，没有勇气正视现实，更没有为社会和现实服务。唐文标的这篇文章在台湾文坛引起轰动，被称为“唐文标事件”。现代派诗人余光中立即著文反驳，指出要诗人去改造社会，是不公平的，被政治家搞乱了的世界，竟要责成诗人去加以改造，是苛求太甚。“唐文标事件”以后，出现了“拥唐派”和“反唐派”，争论的范围也由“现代诗”而扩展到如何评估台湾现代派文学这个问题上。

这场以“现代诗”为中心的论争以1972年为最热烈。

虽然“现代诗论战”的结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观点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但

“回归民族，反映时代”的创作路线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与拥护，现代派在论战中受到沉重打击，乡土文学思潮日渐深入人心。

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在60年代主导台湾文坛潮流，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的。而且现代派作家和理论家们比较系统地分析介绍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培养造就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作家，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作品，在台湾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可抹杀的成绩。虽然有一部分作家的创作走向完全西化的道路，变成逃避现实和消极颓废的文学，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它的贡献。从这一点看，台湾岛内外对现代派的批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当然这和台湾当时所处的环境有一定关系。

1977年前后，乡土文学作家和理论家纷纷发表文章讨论文学的社会基础、发展方向、台湾文学的乡土意识、民族文学等问题，并继续对现代派文学展开批评。著名乡土文学作家王拓写道：“台湾的作家就在美、日殖民主义经济制度和美式教育制度下，不知不觉地学习着西方人的感情和思维方法，跟随他们世纪末的颓废的世界观，仿效他们麻木、荒谬、病态的姿态，不断地透过报纸杂志广泛地介绍艾略特、卡夫卡、萨特、卡缪、劳伦斯等等，还利用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来解说‘荒原’、‘城堡’、‘异乡人’是何等伟大的作品，甚至还回过头来，用这些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来规范、品评台湾乡土成长的作品。这种现象就造成了台湾文学界相当普遍的缺乏具有生动活泼、阳刚坚强的生命力的文学作品，而到处散发出迷茫、苍白、失落等无病呻吟、扭捏作态的西方文学的仿制品。而他们又自封为社会的上等阶级，对一般不能理解其伟大作品的凡夫俗子，持着一种傲慢的、不屑一顾的态度。”^⑤

面对乡土文学派的批评，现代派作家们自然不甘于他们的成绩被一笔抹杀，也不甘于他们的理论被否定。一些现代派作家继续站在原来的立场上，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辩护。王文兴提出文学象科学一样是独立的，与同情不同情大众没有关系。“拿文学去帮助穷人是最无效的方法，如果你碰见一个穷人，对他说：‘你太可怜了，我现在送你一首诗吧！’那岂不是侮辱他？”^⑥

这些论争其实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和深入，是现代派和乡土文学派继“现代诗论战”之后的又一次交锋，双方各执己见激烈论争，这是乡土文学论战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

二

经济方面，乡土文学作家和理论家对台湾殖民地经济的分析与批评，对下层劳动人民寄予的深切的同情，触动了台湾当权者的神经，扩大了论争的范围。

50年代、60年代的台湾经济，是靠美、日等国大量的“军援”、“经援”发展起来的，是一个由农业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过程。70年代，由于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的空前孤立，于是便在经济上进一步放宽政策，大量吸收外资，使台湾经济在表面上一度十分繁荣。国民党当局也因此而大肆夸耀，“我们自由基地的安定、繁荣、壮大，最使匪共寝食难安。因为我们实行了三民主义，使中华固有文化得以发扬，国家建设各方面都有进步；经济快速发展，均富而非均贫，人民生活大幅提高至富裕乐利的境地。”^⑦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知道，台湾经济的繁荣是以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和农产

品的低价格换来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人城市，农村人口年龄老化，大量土地荒芜，使农民和城市下层劳动者的生活陷入极端困苦的境地。乡土文学作家王拓举过这样一个实际的例子：“根据政府的说法，目前稻谷每公斤订为新台币十元的保证价格，可以使农民获得百分之二十的利润。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到底是多少？……百分之二十的利润是一万八千元，一户农家月入是一千五百元，还不如一个工厂女工。”^⑧

这就是台湾农民当时的情况，一户的月收入还不如一个工厂的女工，这能算作“人民生活大幅提高至富裕乐利的境地”吗？

台湾当局大量吸收外资，在经济上进一步放宽政策，目的是为了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处境和安定民心，结果却事与愿违。经济繁荣的结果是外国资本家和一部分台湾中产阶级富了，却使许多农民破了产，“对内来说，贫富的差距也慢慢的显著起来，现在固然还没有象其他现代化国家那么大的资本家，但富的与贫的差距也有霄壤之别”^⑨社会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使爱国的知识分子和乡土文学作家们认清了台湾殖民地经济的弊病和帝国主义“经援”的侵略本质，他们开始步入社会各个角落去调查研究，把自己的关心和爱带给下层劳动人民。“这段时间（民国六十年以后）的台湾社会，由于国际重大事件的冲激，与国内经济极不平衡的发展，而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帝国主义，与反抗殖民经济和买办经济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要爱国家、爱民族，要关心社会大众的生活问题。”^⑩“为了反对垄断社会财富的少数寡头资本家，自然会对现行的经济体制下各种不合理的现象加以批评和攻击，自然要对社会上比较低收入人赋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⑪

· 对乡土文学作家的这种分析批评，台湾马上有人著文反驳。在指责乡土文学作家的“反帝”主张时，彭歌写道：“当我们全民一致为自由与生存而奋斗之时，我们的‘反帝’，首先是反共产主义的赤色帝国主义，以中共为代表的邪恶势力，正在对我们挑战，如果说‘反帝’而不谈‘反共’，这是没有掌握到世局的重点。‘反帝’如只是反对以美、日为主的外来资本，是否是一种极不高明的‘转移目标’？”^⑫

彭歌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反帝”就是“反共”，如果“反帝”是反对美、日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那是反错了对象。这话如果算不上蛮不讲理，也是一种高明的“转移目标”了。乡土文学作家是在分析台湾的经济，他却扯到“反共”大业上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谈到社会上的贫富不均应对下层人民寄予同情时，彭歌又说：“文学和文学家，‘对社会上比较低收入的人赋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应该的事，但除此以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人的善恶、事的是非，而不只是贫富问题。在可以用数字衡量的‘物’以外，人更有‘人’的价值标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在今天社会上虽然能真正一一实践者已经不多，但依然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价值标准，也仍然有相当的影响与约束力。一个人是好是坏，应该从‘人’的价值来衡量，来评鉴，而不是以他的收入高低作为唯一的尺度。”^⑬

在这里彭歌又一次巧妙地转移了话题，他避而不谈社会上贫富悬殊的原因，却说了一大通忠孝仁义之类的国民党八股，让人不知所云。

台湾的一部分“文艺评论者”历来对乡土文学就有某种偏见。正如他们所说的：“当年被人提倡的‘乡土文学’有变成表达

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的危机。”^⑭“再看某些‘乡土文学’（很少的几篇）作品的内容，令人感到并不是要‘正确地反映’，而是有着恶化‘社会内部的矛盾’之倾向。”^⑮

正是因为有这种看法，所以乡土文学作家和理论家一旦对台湾的殖民地经济提出批评，立即就招致这些人的指责。

“在中华民国的国土之内，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却被形容为‘殖民经济’、‘买办经济’，这不仅是对政府的不公道，也是对胼手胝足、呕心沥血努力建设的同胞极大的侮辱。”^⑯

这段话明白一点说，即乡土文学作家们对“政府”不公道了，犯禁了。台湾当局的高压政策是不允许人们对当局的经济政策作批评式的分析的，不管这种分析的正确与否。只要说政府坏话，马上就会有人站出来大加讨伐。

关于对台湾经济的讨论是乡土文学论战中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过这方面的内容已经不是纯粹的文学性的了。民以食为天。乡土文学作家们对台湾经济的批评，对人民生活的关注，让人们看到了作家们的良心和责任心，不想这种关注和批评象导火索一般，引来了严厉的讨伐，论战的范围也因此而扩大了。

三

70年代初，台湾接连受到几个重大国际事件的冲击，是乡土文学论战产生的一个外部因素。

1970年发生了钓鱼岛事件。钓鱼岛本来是我国台湾省的一个海中小岛。1970年，美国将在二战之后托管的日本琉球群岛归还日本时，竟将钓鱼岛作为琉球群岛的一

部分，一起交给日本。此事立即引起海外中国人、留学生和台湾学生的极端愤慨，并展开了对美国、日本的激烈的抗议行动，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的运动。但是台湾当局惧于对美、日政治、经济上的依赖，不仅对海内外的学生运动不予支持，反而对爱国的学生进行政治恫吓，甚至诬蔑他们是被“中共”利用。台湾当局的这种对美、日示弱的表现，使爱国的学生更加激愤，“保钓”运动愈演愈烈，他们甚至喊出了“五四”时期的口号：“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保钓”运动虽然后来被镇压下去了，但却大大弘扬了台湾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

1971年10月，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这是台湾当局在国际上遭受的一次致命的打击。仅仅是几个月之后的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发展已成大势所趋。又过了半年多，日本与台湾断交。

这些接二连三发生的大事件，给台湾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强烈的冲击。他们认识到，要使台湾争取更多的国际生存空间，首先还在于自己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的革新，青年知识分子们不仅要在言论上，并且在行动上，要求参加更多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许多青年参加有关国事问题的座谈会，要求更多的言论自由与政治民主，学校纷纷组织社会服务团对农村、渔村、工矿问题进行实际调查。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77年，乡土文学作家和理论家王拓、尉天骢、陈映真在关于乡土文学的讨论中，提出文学要反映社会内部矛盾，并提出要求台湾当局开放30年代文学作品。这些主张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台湾当局长期以来的反共心理，造成

一种近乎偏执的“文艺指导”原则，就是在文艺上也与中共不共戴天。台湾在国际上遭受挫折而引起的对社会内部矛盾的反省和乡土文学作家的一些理论，便使他们疑神疑鬼而大加指责。现代派诗人余光中在文章中引用了几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写道：“以上引证的几段毛语，说明了所谓‘工农兵文艺’是个什么样的‘新东西’。其中的若干观点，和近年来国内的某些‘文艺批评’，竟似有些暗合之处。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⑩

如此一来，论战突然升级，对乡土文学作家、理论家的政治指控铺天盖地而来。乡土文学派要么是台独分子，要么成了共产党的统战工具。甚至著名文艺理论家尉天骢的家里有警察频频出入，有人还质问尉天骢执教的台湾政治大学为什么不把尉解聘。

这就是著名的“乡土文学事件”。关于那些与余光中观点相同的批判乡土文学作家的文章，我们大概不必引述其内容，只看看其中几篇的名字就可以了：《消除文坛“旋风”》（代序）^⑪、《正视这股邪恶烟幕》^⑫、《粉碎共匪文艺邪说的要务》^⑬、《揭穿共匪文化统战阴谋》^⑭、《动员文艺，团结全民，争取反共胜利》^⑮……一般人看到这些题目大概都会猜测一番，这是文学论战吗？这已经是威胁和恐吓了。

面对如此骇人的责难，乡土文学作家和理论家们并没有被吓住，曾因阅读毛泽东、鲁迅书籍背上“通匪”罪名而被国民党当局监禁了八年的陈映真这次又站到了论战的前列，从他的笔下迸出这样一段义正辞严的文字：“从中、外、古、今的文学

史去看，向来没有一个或一派作家，可以藉着政治的权威，毁灭、监禁别个或别一派的作家及他们的作品，而得以肯定或提高自己在文学上的地位的，也从来没有一种有价值的文学，可以因杀害或监禁了那个文学的作者，禁止的那个文学的作品，而铲除他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的。”²⁸

一场文学论战发展到这一步，逼得作家发出如此悲壮的呐喊，确实让人啼笑皆非，但个中原因却并不难探究，“60年代以降接二连三的外交挫折和此间长期以来唯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事实确实隐伏着两种令执政当局非常尴尬的危机，其一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其二是弱势阶级的苦难——正由于这两者都曾经在左翼知识分子的鼓吹之下造成对腐败政权的严重打击，是以适于结合此二者的‘乡土文学’理念或理论就自然而然令惊心起疑之士视之为一项政治斗争的策略。另一方面，从‘写（现）实主义’到‘社会写实主义’只是文学工作者意图改善（或改造）社会的一小步，从‘社会写实主义’到‘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也只是文学工作者在急于改善（或改造）社会的意图受挫下使其作品浪漫化、粗糙化的另一小步，辗转走出这两步的作家未必要受到‘共党邪说的煽惑’，也未必要受到‘阴谋野心分子的鼓舞’，……”²⁹

这一段话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戳到了国民党的痛处。在历史上，30年代的中国左翼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曾给国民党政权以异常沉重的打击，使国民党在几十年之后犹有余悸，而乡土文学作家们竟然要求开放当局禁止的30年代作品，要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工农兵”的生活，也难怪乡土文学作家要招致政治指控了。

不过话说回来，文学自有文学本身

规律。70年代台湾的政治经济状况迫使作家们要注视社会的内部矛盾，要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是自然而然的文学现象。不能因为它与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有“暗合之处”，就非一棍子打死不可。这样的文艺政策只会严重阻碍文艺的正常发展。

重大国际事件的冲击，是乡土文学论战产生的外部因素，但掩盖在外部因素下的，也有许多深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任何一种文学的现象都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项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虽然时间很长、规模很大，但它并不是毫无来由地突然爆发出这一场激烈的文学论战。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它是由台湾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诸项因素所孕育出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它的产生是有原因的。

同时，乡土文学论战使台湾的文学工作者们有机会对台湾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一次系统的回顾、反思、分析、展望，对台湾文学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考察台湾文学包括台湾乡土文学时，应该将其置入整个中国文学的框架内进行分析探讨，只有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对台湾文学有一个正确的把握。

值得高兴的是，随着两岸经济交往的日趋频繁，文化上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相信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发展，台湾的文学工作者和大陆各地的文学工作者都能在相互交流中共同提高自己，使我们中国的文学迈上一个新的高度。

注释：

- ① 陈映真《新的阅读和论述之必要》，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1年1月6日。
- ② 台湾《龙族诗刊评论专号》，1973年。
- ③ 台湾《文季》杂志，第1期，1973年8月。
- ④ 台湾《中外文学》杂志，2卷3期，1973年8月。
- ⑤ 王拓《是“现实主义”，不是“乡土文学”》，台湾《仙人掌》杂志，第1卷第2期，1977年4月。
- ⑥ 吴潜诚《访王亮兴谈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台湾《联合报》副刊，1977年8月24日。
- ⑦ 《严防敌人的一切渗透、分化与颠覆阴谋》，台湾《中央日报》社论，1977年8月31日。
- ⑧ 王拓《拥抱健康的大地》，台湾《联合报》副刊，1977年9月10—12日。
- ⑨ 陶百川《台湾怎么能更好》，香港《中国人》杂志，1979年12月号。
- ⑩ 同⑤。
- ⑪ 李拙（王拓笔名）《廿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动向》，台湾《中国论坛》杂志，第4卷
- 第3期。
- ⑫ ⑬ ⑮ ⑯ 彭歌《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台湾《联合报》副刊，1977年8月17—19日。
- ⑭ 银正雄《坟地里哪里来的钟声》，台湾《仙人掌》杂志，第1卷第2期，1977年4月。
- ⑯ 余光中《狼来了》，台湾《联合报》副刊，1977年8月20日。
- ⑰ 这篇文章是台湾批判乡土文学作家的文集《当前文学问题总批判》的序。作者尹雪曼。
- ⑱ 台湾《青年战士报》副刊，1977年9月10日。作者魏子云。
- ⑲ 台湾《青年战士报》副刊，1977年8月22—24日。作者王集丛。
- ⑳ 台湾《国魂》杂志，1977年11月号。作者方心预。
- ㉑ 台湾《青年战士报》社论，1977年9月1日。
- ㉒ 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台湾《中华》杂志，1977年10月号。
- ㉓ 张大春《丢帽子 砸招牌——言论钳制时局的意识型态论争》，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1年1月7日。

总 目 录

国际政治·国际经济

- | | |
|---------------------|-------------|
| 垄断资本与美国政治 | 樊体宁 (92. 1) |
| 论日本金融政策和政策手段 | 王世文 (92. 2) |
| 第三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 | 王朝文 (92. 2) |
| 变化中的国际经济格局 | 李 琦 (92. 2) |
| 美国权势集团初探 | 樊体宁 (92. 3) |
| 日本院外活动与日美经贸摩擦 | 张业亮 (92. 3) |

哲学·经济学

- | | |
|-------------------------|-----------------|
| 如何看待当前社会主义问题 | 杨家祚 (92. 1) |
| 关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 | 杜 一 程礼泽 (92. 1) |
| 马克思主义与无神论 | 冯 丹 (92. 1) |
| 论人生价值 | 杨家祚 (92. 3) |
| 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 冯 丹 (92. 3) |
| 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几个问题 | 杜 一 程礼泽 (92. 4) |

外语教学研究

- 试论日语专业听力教学 米 强 (92. 1)
卢梭与外语教学
——兼论外语教学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 马秀兰 (92. 2)
关于日语句子基本成分划分问题 王庆民 (92. 2)
谈英语语法和习惯用法 赵成才 (92. 3)
对高校英语专业四级统测的几点看法 朱伟文 (92. 3)
论《英美电影文学课》教学 杨慎生 (92. 4)
外语课堂教学行为探讨 仇书琇 (92. 4)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现象 王钟华 (92. 4)

外国文学

- 漫谈译名 郑永慧 (92. 1)
梅里美和他的短篇小说 郑永慧 (92. 3)
《神的面具：东方神话》译后记 劳 隆 (92. 4)

中国语言·文学

- 论“新乐府”创作 高玉昆 (92. 1)
论古代文言小说的细节 陈炳熙 (92. 1)
论汉语书面表达中的形貌修辞 吴家珍 (92. 2)
《宋词三百首全译》前言 沙灵娜 (92. 2)
李白杜甫诗意图探究 高玉昆 (92. 2)
新诗史上的朱湘 郭小聪 (92. 3)
《文心雕龙》的应用文论初探 刘春生 (92. 4)
汤显祖创作思想管见 范国明 (92. 4)
论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起因 王义伟 (92. 4)